

英语学习策略及词汇量研究综述

余舒林, 董哲, 黄思烨, 刘瑜婷, 杨海容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2年5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2年6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2年7月4日

摘要

近几十年来, 关于语言学习策略和词汇量测试的研究有很多, 文章重点研究了使用Oxford (1990)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即SILL量表)的学习策略研究, 以及使用VST词汇测试量表对词汇的研究。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结果等方面梳理了研究现状, 分析表明, 即使基于相同的尺度, 在不同的条件下, 也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因此, 有必要对不同背景的学习者进行更细致、更准确地调查和研究, 以便提出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学习建议。

关键词

英语学习策略, SILL, 词汇量测试, VST, 接受性词汇量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Vocabulary

Shulin Yu, Zhe Dong, Siye Huang, Yuting Liu, Hairong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y 23rd, 2022; accepted: Jun. 27th, 2022; published: Jul. 4th, 2022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vocabulary tes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using Oxford's (1990)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 and the vocabulary research using the VST. The research status is sort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ult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even based on the same scal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conclusions will be draw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more detailed and accurate surveys and researches on learn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make m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SILL, Vocabulary Test, VST, Receptive Vocabular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词汇是语言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词汇量的大小既能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水平和效果,也是衡量语言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词汇学习还是其他方面如语法等的学习,都要运用一定的语言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运用情况也可以为教师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提供依据和方向。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词汇量和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在学术界,关于学习策略的权威调查量表是由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Oxford 于 1990 年提出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 SILL)。Ellis (1994: 539)认为,“这份量表可能是至今最具综合性的。” [1]。在词汇测试方面,选取了 Paul Nation 在 2007 年提出的 VST 词汇测试量表。一系列研究表明,两者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研究。

2. 英语学习策略研究情况

对我国英语学习策略量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李炯英, 2002) [2]。近年来对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关注度也呈上升趋势。

2.1. 研究方法

大多数研究是通过向随机抽样的学生发放 Oxford 量表问卷进行调查,并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如 SPSS 等分析结果。有些研究对量表进行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补充和修改(如姚瑛, 2006) [3],有些研究在分析结果后还会对学生进行访谈(如李炯英, 2002),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及其原因,使结果更加真实可信。

2.2. 研究对象

早期,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优秀的学习者,研究者从他们身上总结语言学习的特点,从而形成有效的、可推广的学习方法。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也需要了解低水平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比较高低水平英语学习者在学习策略运用上的差异,探究其深层原因,才能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更好地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水平[4]。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学生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越来越方便,研究对象也趋于多元化,如针对高职学生(如周清, 2011) [5]、面向少数民族学生(如黄河、冯家佳, 2014) [6]、面向特定高校和特定地区的各专业的普通学生、面向国内外学生对比研究(如张立新、李霄翔, 2004) [7]等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不同群体的英语学习者对改进学习策略、提高英语水平有了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依据。

2.3. 研究内容及结果

在学习策略研究中,除了常见的对学生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调查外,还有对 SILL 量表在汉语环境(姚

孝军、陈静、杨亚敏, 2021) [8]和中国高职环境下(肖涌, 2021) [9]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英语学习策略与学生的性别、学生的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以及一些比较研究, 如一年后同一批学生的策略变化(张宁, 2014) [10]、不同阶段大学生使用策略的比较(姚孝军、陈静、杨亚敏, 2010) [11]、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和水平较低的学习者使用学习策略的异同比较(刘亚宁, 2004) [12]、国内外学生英语学习策略对比(如张立新、李霄翔, 2004) [7]等等。

首先, 在学生在学习策略的运用上, 在不同群体的受试者中有不同的结果。在高职学生的研究中, 林学梅(2020) [13]和肖涌(2021) [9]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补偿策略在高职生中使用频率最低。但在林学梅对四川幼专的研究中, 学生使用最多的是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13], 而在肖涌对广州、深圳两所职业院校理工科学生的研究中, 学生使用最多的是认知策略, 其次是元认知策略[9]。然而, 周清(2014)在对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67 名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补偿策略, 而最少使用的是记忆策略” [5]。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中, 黄河和冯家佳在广西大学 2014 年对 104 名非英语专业壮族大学生进行了学习策略调查, 发现“学生最常使用的学习策略依次是元认知、认知、社交和情感等策略。英语成绩与记忆、认知、元认知和补偿等策略的使用存在显著正相关” [6]。

其次, 在对 SILL 量表的测试中, 徐爽于 2008 年进行了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 发现语言学习策略的结构与 Oxford 的理论基本相符[14]。2021 年姚孝军、陈静、杨亚敏对某农业大学共 734 名涵盖多个学习阶段的学生进行了分层抽样, “利用 AMOS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考察模型包括 SILL 的 6 个子策略的分量表单因子模型和总量表的 6 因子模型” [8], 以探讨 SILL 量表在汉语环境中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 SILL 量表在研究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策略方面具有较高的信度, 但结构效度不是很高。因此, 他们根据分析结果对原始量表进行了修正, 获得了良好的效度。而在高职院校外语学习的情况下, 2021 年肖涌借助 SPSSAU (2020)网页版, 分别对广州和深圳两所高职院校理工专业的大一、大二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发现“Oxford 的 SILL 量表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应性, 适合对中国高职外语学习者的测量和研究” [9], 但在“各个分项策略所占的权重以及和总策略的相关度并不一致” [9]。

在学习策略和许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有共同的结论, 也有许多不同的结论。

学习策略的使用和英语学习水平的关系方面, 许多研究得出了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李炯英, 2002 [2]; 黄河、冯家佳, 2014 [6]; 姚孝军、陈静、杨亚敏, 2010 [11]等)。在李文、张军 2018 年的文章中, 分析发现, “记忆策略、情感策略与英语成绩的相关受被试类型、考核方式的调节作用, 即不同被试、不同考核方式下的相关系数大小不同; 其他学习策略与英语成绩的相关则不受考试类型、考核方式的影响。同时, 语言学习策略与英语成绩的相关不受出版类型的影响。” [15]。

学习策略与学生性别的关系方面, 有研究认为使用学习策略并没有明显的男女差异。如李炯英对东南大学 2002 年三个院系英语学习者的调查, 姚瑛 2006 年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 少数民族本科生、专科生、本科英语专业学生、本科非英语专业学生、专科英专生和专科非英专生在策略的使用上均没有明显的男女差异。然而, 在黄河和冯家佳 2014 年对广西大学 104 名非英语专业的壮族学生的学习策略调查中, 姚孝军、陈静、杨亚敏在对某农业大学 2010 年各阶段学生的综合调查中、2011 年周清在对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67 名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学习策略调查中, 均发现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通常是女生使用更多类型和更高频率的策略。但是, 关于不同学习策略使用的差异程度, 有着不同的结论。所以, 性别因素是否会影响到学习策略的使用以及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十分复杂, 往往很难界定。

关于两组或两组以上不同受试者群体的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差异, 也有许多不同的研究。

2014 年, 张宁对新进本科院校刚入校和入校一年后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调查,

旨在探讨“新建本科院校新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的变化趋势，并探讨它是否能反映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此方面存在问题”[10]，结果表明，“无论是学生对策略的总体使用水平(有时使用阶段)，还是学生最常用(补偿策略)和最不常用(记忆策略)的策略上，前后变化均不大；但社交策略提升幅度较明显，学生反映，这与被调查学校教师要求的小组合作学习有一定关系”、“经过一年的大学英语学习后，学生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仍是有时使用阶段。但总体策略的标准差变化较大，这说明大学期间，学生英语学习的两级分化现象加重了……一学年后学生最常用和最不常用的策略没有变化，依然分别是补偿策略和记忆策略”[10]。在2010年姚孝军、陈静、杨亚敏对某农业大学各个阶段学生的综合调查中，“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各种学习策略的使用偏好不同；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于那些与英语水平相关程度更高的策略的使用频度低于来自城市的学生……优生和中上水平的学生在绝大多数语言学习策略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记忆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博士生在各种学习策略的使用频度上要高于其它学习阶段的学生……说明学习策略的使用和学生语言时间的长短还是有联系的……但其发展是一个积累渐进的过程。有的策略的使用频度可能会与学生特定阶段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来自省城、地级城市和县级以下地区的学生在补偿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的所有表现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11]。

在成功的学习者和不成功的学习者的对比研究中，刘亚宁“根据CET-4成绩和前两年英语期末平均测试成绩，从山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的140名学生中选取了40名学生”[12]进行调查，发现两类学生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两类学生使用补偿、情感和交际策略的频率不高，但使用记忆、认知的频度较高，但是成功的学习者使用元认知的频率远远高于不成功的学习者……成功的学习者比不成功的学习者更频繁地使用记忆策略”[12]，学习策略的总体使用实际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成功学习者使用学习策略的质量可能比不成功学习者高，他们更善于运用学习策略。

在国内外比较研究方面，2003年赛丹把李炯英2002年基于东南大学学生的学习策略研究和Carol Griffiths、Judy M. Parr在2001年对“从新西兰各类英语学校(私立语言学校、三级学校和中学)中抽取的英语第二语言学习者”[16]的调查研究，做了比较。在李炯英的调查中，“中国学生最常使用的是记忆、认知以及元认知，其次补偿，最不常使用的是社交和情感”[2]，但在新西兰的这项研究中，英语学习者的最常使用为社交，其次是元认知、补偿和认知以及情感，最不常使用的则为记忆[17]，赛丹从语言学习环境、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以及与学习者相关的多重因素这三个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对国外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研究中，2010年欧阳偶春、邹亮对莫桑比克大学生进行的学习策略研究值得注意，因为学术界对非洲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关注较少。他们随机选取了莫桑比克共和国爱德华蒙德拉内大学(莫桑比克最好的综合性大学)的120名学生(54名男生，66名女生)来研究学习策略，发现“莫桑比克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的总体平均数值为3.17，使用频率处于中间。在六种学习策略中，社会策略使用频率最高，其次分别是情感、认知、补偿和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使用最少”[18]。在对国内外学习者的对比研究中，2004年张立新、李霄翔进行了对“在英国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College (CCCUC)学习公共英语的中国学生和西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学生的自主性总体上不比西欧学生差。他们有信心能学好英语，有较强的工具性学习动机，能努力参加课堂活动，采取适当的学习策略，恰当地评价自己的学习。但融入性的动机不够强，与教师的沟通不够充分，选材缺乏自主权。过分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对文化的理解”[7]。

3. 英语词汇量测试研究情况

总体而言，我国使用VST词汇测试量表对大学生词汇量进行调查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其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上。

3.1. 研究方法

与学习策略研究类似,大多数研究向学生发放 VST 量表试卷(根据不同研究提供英语版和英汉版),并根据被试者水平等实际情况选取了 VST 量表中的前若干个 1000 词而舍弃后面部分的词进行测试,得到分数结果后再使用 SPSS 等工具进行分析。

3.2. 研究对象

与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相比,使用 VST 进行词汇量测试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那么多样化,而且大部分是针对研究者所在院校的学生进行的研究。

3.3. 研究内容及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 VST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的结论。

在专门针对 VST 英汉版本的研究方面,王宇和樊宇以四级成绩为分组标准,在 2010 年“对 VST 英汉版本进行了难度、单因素方差和 Scheffe 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等,数据表明,英汉版本的 VST 具有良好的效度,可以有效地衡量不同水平学习者的接受性词汇量”[19]。赵平、纪晓丽 2016 年的研究表明,VST 量表“可以有效地检验受试者的接受性词汇量并区分水平”[20]。

在 VST 的英文版和双语版的研究中,2018 年付玉萍、刘振前通过对海南省某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大二、大三 9 个自然班学生进行测试,以专四成绩为分组依据,对比分析了二者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英汉版本得分明显高于英文版;两个版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均较高,但英汉版本的信度高于英语版,且前者各等级得分与总分的相关性均比后者高……高、中水平学习者对低频词汇的认知率没有显著差异。英英版和英汉版 VST 测试的同时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学生双语和单语版词汇测试成绩相关性和学生第二语言水平呈现同步趋势,低水平学习者更适合双语版 VST 测试,对于高水平的学习者,英英版和英汉版 VST 测试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两个版本具有同等的效度”[21]。国外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Hosseini Karami 等(2017) [22]对伊朗 116 名不同学习水平的英语二语学习者进行了 VST 英版和波斯语-英语双语版本的比较,发现两个版本的 VST 都具有较高且几乎相同的可靠性,都可以区分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但中低水平的学习者在这两个版本下有不同的结果,他们在英语版测试所得到的词汇量低于波斯语-英语版本,而高水平学习者在这两个版本中的词汇量没有明显差异。这与付玉萍和刘振前的结论有相似之处。

在对学生词汇量现状的调查研究中,鲍甜美、顾炜俊、黄文川(2019)对普通本科院校 2016 级大二下学期汽车制造与金融工程专业共 114 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包括 38 名男生和 76 名女生。他们发现,“学生对两千词级内的高频词认知度较高;对三千到五千词级内的词掌握不牢;对五千词级以上的词认知度严重匮乏……女生词汇量明显高于男生,两个不同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词汇量无显著差异……受试的理科生在大二/四级阶段的平均词汇量达到 4785 个,其中最小词汇量为 2800 个,最大词汇量为 7400 个。其平均词汇数与 07《要求》规定的一般要求的 4795 个词汇量大体相当”[23]。范娜(2021)研究了中国中西部四所高校(三所国家重点本科院校和一所普通院校)419 名非英语专业大二、大三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她按照四级成绩划分水平组,结果显示,“学生的词汇量为 6494 词族……男女学生仅在接受性词汇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的词汇量显著高于男生;理工科学生接受性词汇量显著高于文科学生……高水平组学生的接受性词汇量显著高于中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学生,中水平组学生的接受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深度均显著高于低水平组学生”[24]。

此外,王子颖(2014)对绍兴文理学院的人文学院和医学院本科二年级(2011 级)96 名学生进行了词汇对语言水平的预测性研究,以 CET-4 和 CET-6 作为英语水平的依据。结果显示,“词汇量跟四级成绩显

著相关,但与六级成绩的相关性不明显”[25],这表明词汇量对语言水平的可预测性是有限的,当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扩大词汇量来提升语言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习策略研究还是词汇测试研究,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尺度(即相同的测试量表),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如学习策略研究中涉及性别的研究就有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可能与被试者总体水平、样本选择、教育经历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这启发我们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待不同的结果,同时也正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有必要对不同背景的学习者进行更详细、更精准的调查和研究,从而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更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

致 谢

感谢上海市大创项目[编号:IPP22135]的支持;感谢大创导师郇昌鹏老师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和学术指导;感谢整个大创小组成员齐心协力和高效的团队配合。

基金项目

2021年“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上海交通大学低水平英语学习者词汇量现状与学习策略调查(IPP22135)。

参考文献

- [1] Ellis, R. (1994)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2] 李炯英. 中国学生二语学习策略的观念与运用——一项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 2002, 23(1): 42-49.
- [3] 姚瑛. 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现状及其对策[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8(4): 166-168.
- [4] 张庆宗. 外语学习策略研究综述[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1(2): 241-244.
- [5] 周清. 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2(4): 131-132.
- [6] 黄河, 冯家佳. 广西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问题探究[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4(2): 121-127.
- [7] 张立新, 李霄翔. 中国-西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比调查研究[J]. 外语界, 2004(4): 15-23.
- [8] 姚孝军, 陈静, 杨亚敏.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在中国环境下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及其修正[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9(3): 67-71.
- [9] 肖涌. SILL量表在高职外语学习语境下的验证[J]. 英语广场, 2021(3): 68-71.
- [10] 张宁. 新进本科院校新生英语学习策略调查[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1(S5): 237-239.
- [11] 姚孝军, 陈静, 杨亚敏. 农科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基于大学各阶段学生的综合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135-140.
- [12] 刘亚宁. 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差异性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6): 50-52.
- [13] 林学梅. Oxford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在高职院校的应用——以四川幼专普高起点及中职起点学生为例[J]. 林区教学, 2020(6): 69-72.
- [14] 徐爽. SILL语言学习策略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J]. 外国语言文学, 2008, 25(2): 96-101.
- [15] 李文, 张军. 基于SILL的国内大学生学习策略与英语成绩相关的元分析[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4): 39-47.
- [16] 赛丹. 语言学习策略对比及运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5(5): 105-108.
- [17] Griffiths, C. and Parr, J.M. (2001) *Language-Learning Strategies: Theory and Perception*. *ELT Journal*, 55, 247-254. <https://doi.org/10.1093/elt/55.3.247>
- [18] 欧阳偶春, 邹亮. 莫桑比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调查[J].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10(2): 20-22.
- [19] 王宇, 樊宇. 英汉双语版词汇量测试工具VST的效度研究[J]. 海外英语, 2011(11X): 310-311+335.

-
- [20] 赵平, 纪晓丽. 基于经典测试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的 VST 测试工具效度研究[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6(2): 39-46+59.
- [21] 付玉萍, 刘振前. 英汉版和英语版词汇量测试异同及效度比较[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26(1): 64-69.
- [22] Karami, H., Nejad, M.K., Nourzadeh, S. and Shirazi, M.A. (2020) Validation of a Bilingual Version of the Vocabulary Size Test: Comparison with the Monolingual Ver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 368-380.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7.1391744>
- [23] 鲍甜美, 顾炜俊, 黄文川. VST 测量及分析初探[J]. 皖西学院学报, 2019, 35(4): 88-93.
- [24] 范娜. 英语词汇知识广度和深度的现状和差异研究[J]. 跨语言文化研究, 2021(00): 245-263.
- [25] 王子颖. 词汇量测试对语言水平的预测性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4(2): 71-75+96.